

李家树  
著

# 《 诗 经 》



专题研究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# 诗经

李家树  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诗经专题研究/李家树编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72-5

I. 诗... II. 李... III. 诗经—文学研究  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1747 号

**《诗经》专题研究**

李家树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新世纪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4 插页 186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605-972-5/I·841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065)

## 说 明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常常出席一些学术会议。这些学术会议有些在香港举行，有些在中国大陆、台湾，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远在美、加举行。细数之下，近十年来已参加了国际学术会议四十余次了。我的专业主要是语文研究和《诗经》研究，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有关《诗经》研究的论文累积起来有二十多篇，现在选录其中比较满意的十二篇，以“诗经专题研究”为题合为一书出版，跟同行交流研究心得。

这十二篇论文大部分已经发表过，只有三四篇还没有面世。里面有谈《诗经》故训的，有谈《诗经》的诠释问题的，有谈《诗经》历代的研究发展的，以及宋明以来的一些《诗经》专著的。本着野人献曝的心情，我冒昧呈献出来，请方家批评，并恳切希望得到指正。

这十二篇论文已经写了一段日子，因此，内容方面除了尽量统一各篇的格式（各个会议的要求不同，文章的规格实在难以一致）、改正一些手书之误以外，还作出若干程度的更张。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华昌先生推荐出版，在此谨致谢忱。

李家树

庚辰十二月书于香港大学中文系

# 目 录

## 从经学到文学

- 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读后…………… ( 1 )
- 宋王质《诗总闻》初探…………… ( 31 )
- 王质《诗总闻》的文学观…………… ( 57 )
- 孔子“思无邪”诗说驳议评述…………… ( 78 )
- 《国风》里的“境界” …………… ( 98 )
- 宋程大昌《诗论》对《毛诗序》的态度…………… (119)
- 《诗》“言”字不作“我”解…………… (135)
- 宋朱、王“淫诗”、“删诗”说与明人《诗经》研究
  - 一个传统文化互动个案的剖视…………… (162)
- 美诗？刺诗？淫诗？情诗？
  - 社会转型与《诗经》的诠释问题…………… (188)
- 五四“疑古学派”《诗经》研究述评 …………… (213)
- 英译三家释《诗》假借字述评…………… (236)
- 明李先芳的《读诗私记》…………… (249)

## 从经学到文学

——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读后

《诗经》是诗，不是“经”，但在过去二千多年的历史里，“诗三百篇”曾被尊为经”。①人们一见《诗经》戴着至高无上的“经”字头衔，内容一读又是典丽堂皇的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，于是就不能不神而明之，并对之五体投地了。②汉代儒生为了使《诗》符合“经”的地位，都没有把诗歌当作文学去研究，反而严重歪曲诗歌的原意，用封建道德观点释诗，来达到他们维护封建礼教、巩固政权的目的。③例如《毛诗序》的作者便千方百计把《诗》解释为一种教化的工具，以为它一方面反映前代圣君贤臣的政绩和德行，另一方面则讥刺后代昏王乱臣的恶迹，从而赋予“诗三百篇”以一种鉴戒惩劝的意义。④到了宋代，一般学者企图冲破汉学的藩篱，特别对《诗序》表示怀疑与攻击。他们说“风”乃里巷歌谣，是男女各言其情的诗，很吻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。⑤可是，自宋以来，即使包括号称攻《序》代表作的《诗集传》，还没有一本《诗经》著作真真正正把《毛诗序》

全盘否定。朱熹（1130—1200）虽为攻《序》名家，但他说《诗》的基本观点，跟汉人是一致的。<sup>⑥</sup>他提出“淫诗”之说，肯定《诗》里头有原始恋歌，完全推翻了《诗序》美刺的背景和基础。可惜他根据孔子（公元前551—公元前479）说的“思无邪”一语就说诗本身有邪、正，读《诗》的人不要胡思乱想，对“淫诗”应存着无邪之念，避免被“淫诗”影响。宋儒批评汉人以《诗》说教，身为道学家的朱夫子何尝不是堕入了说教的窠臼？<sup>⑦</sup>他的后学更奉《诗集传》为正统，撇开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而专门空谈义理，把对诗歌的解释变成极其主观的臆测和说教。<sup>⑧</sup>直到五四运动（1919）以后，以胡适（1891—1962）、顾颉刚（1893—1980）为首的“疑古学派”才风起云涌地反对旧说，主张扬弃教化观点，把《诗经》由“五经”的宝座拉下来。<sup>⑨</sup>他们不满汉儒以降的“美”、“刺”之说，也不满宋人反对汉儒不彻底，呼吁要“救《诗》于汉宋腐儒之手，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，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”，<sup>⑩</sup>扫去层层云雾，从民间歌谣的角度去探讨《诗经》的内容。<sup>⑪</sup>至此，《诗经》的经学地位下降，文学价值相继提高。

如果说五四时代的“疑古学派”，在反传统和浪漫主义影响下，用文学眼光看《诗》，推倒二千年种种附会见解，只是反映了事实的一半。在他们之前，在清代一早就有了先行者！

汉学至郑玄（127—200）而集大成，于是郑学风行数百年；宋学至朱熹而集大成，于是朱学风行数百年。<sup>⑫</sup>“诗经学”延续至清代，在继承前代累积下来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，呈现出流派迭出、著述如林的异常活跃的现象。<sup>⑬</sup>清代研究《诗经》的学者，差不多都卷入了派系家法的纷争，只有姚际恒（1647—1715?）、崔述（1740—1816）、方玉润（1810—1883）等，试图

逾越汉、宋学的藩篱，努力缘文索意，以诗论诗。<sup>⑭</sup>崔述的《读风偶识》，写成于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尝试打破汉宋门户之见，就诗求义；可惜没对整部《诗经》作出探究，有时“更多的则是泛论天下兴亡、国家治乱之理和风俗民心、人情世事诸问题”，“在体例上不够完整统一，确实如题中所标，带有‘偶识’的特征”。<sup>⑮</sup>因此，谈到清代真正跳出传统“诗经学”牢笼的代表人物，以姚际恒、方玉润为主。

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，写成于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，是“各派混战中的超然的一派”，<sup>⑯</sup>五四时代的《诗经》学者，就提出这部书作为前人推翻旧说的一个典范。<sup>⑰</sup>姚氏摆脱宗派门户之见，指出汉学和宋学各有缺点和谬误；“汉人之失在于固”，《诗序》“虽不无一二宛合，而固滞、胶结、宽泛、填凑，诸弊丛集”；“宋人之失在于妄”，《诗集传》“时复阳违《序》而阴从之，而且违其所是，从其所非焉。武断自用，尤足感世”。<sup>⑱</sup>又主张“涵泳篇章，寻绎文义，辨别前说，以从其是而黜其非，庶使诗意不致大歧，埋没于若固、若妄、若凿之中”，<sup>⑲</sup>从诗的上下文中探求诗人原旨。所揭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可说是前无古人的。百多年后的方玉润受了这部书的很大影响，写成于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4）的《诗经原始》，继承并发挥了姚氏的研究成果，同样企图打破传统，要做《诗经》旧学的革新派。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交代得很清楚：

最后得姚氏际恒《通论》一书读之，亦既繁征远引，辩论于《序》、《传》二者之间，颇有领悟，十得二三矣，而剖抉未精，立论未允，识微力浅，义少辩多，亦不足以针育而起废，乃不揣固陋，反复涵泳，参论其间，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。不



顾《序》，不顾《传》，亦不顾《论》，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正，名之曰《原始》，盖欲原诗人始意也。虽不知其于诗人本意何如，而循文按义，则古人作诗大旨要亦不外乎是。<sup>②0</sup>

书名《诗经原始》，就是不满于旧说的附会曲解，要根据诗文去寻求诗人作诗的原意。

《诗经通论》和《诗经原始》还有一个特点，作者和当时一般经学家不同，他们“圈评”、“圈点”《诗经》，视之为文学作品。在这两本书里，可以找到不少精彩评语。<sup>②1</sup>这些评语证明作者不单超越了经学的范围来欣赏《诗经》的文学艺术，也往往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指摘前人穿凿之失。《诗经通论》卷前《诗经论旨》说：

诗何以必加圈评，得无类月峰、竟陵之见乎？曰：非也，予亦以明诗旨也。知其辞之妙而其义可知；知其义之妙而其旨方可知。学者于此可以思过半矣。且诗之为用与天地而无穷，“三百篇”固始祖也，苟能别出心眼，无妨标举，忍使千古佳文遂尔埋没乎！爰是叹赏感激，不能自已；加以圈评，抑亦好学深思之一助尔。<sup>②2</sup>

《诗经原始》卷首上《凡例》说：

故不惜竭尽心力，悉为标世，既加眉评，复著旁批，更用圈点，以清眉目，岂饰观乎？亦用以振读者之精神，使与古人之精神合而为一焉耳。<sup>②3</sup>

现举《秦风·蒹葭》为例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/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/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<sup>②4</sup>

《诗经通论》卷七说：

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，而人慕而思见之诗。“在水之湄”，此一句已了。重加“溯洄”、“溯游”两番摹拟，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，于是于“在”字上加一“宛”字，遂觉点睛欲飞，入神之笔。上曰“在水”，下曰“宛在水”，愚之以为贤人隐居水滨，亦以知之也。（《集传》曰：“上下求之而皆不得。”诗明先曰“道阻且长”，后曰“宛在”，乃以为皆不可得，何耶？如此粗浅文理，尚不之知，遑言其他！既昧诗旨，且使人不见诗之妙，可叹哉！）<sup>②5</sup>

《诗经原始》卷七说：

此诗在《秦风》中，气味绝不相类，以好战乐斗之邦，忽遇高超远举之作，可谓鹤立鸡群，邈然自异者矣。然意必有所指，非泛然者。《序》谓刺襄公，未能用周礼，吕氏祖谦遂谓伊人犹此，凿之又凿，可为喷饭。盖秦处周地，不能用周礼，周之贤臣遗老，隐处水滨，不肯出仕，诗人惜之，托为招隐，作

此见志，一为贤惜，一为世望。曰伊人、曰从之、曰宛在，玩其词，虽若可望不可即；味其意，实求之而不远，思之而即至者，特无心以求之，则其人侷乎远矣。<sup>②</sup>

可见二人从文学角度来研究《诗经》的好处，是能够摆脱以《诗》说教的影响，成功地探究诗的原义。因为排版困难，他们对《蒹葭》一诗的“眉评”、“旁批”、“圈点”都不列出来了（可参〔附页1及2〕）。《蒹葭》的旨意，《毛诗序》又说与教化有关：“《蒹葭》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礼，将无以固其国焉。”<sup>③</sup>《诗集传》卷六说：“言秋水方盛之时，所谓彼人者，乃在水之一方，上下求之而皆不得，然不知其何所指也。”<sup>④</sup>但是，如能像姚、方般分析“在水”、“溯洄”、“溯游”、“宛在”等句的艺术手法，这首诗的旨意就可以豁然开朗，不至于胡诌些什么秦襄公不能用周礼以固其国，或不知何所指了。

从文学角度来研究《诗经》，先由姚际恒倡导，方玉润因之而得到启发，是无可置疑的；奇怪的是，方玉润对姚际恒却多苛求和贬损之词（见上引述）。无论如何，他的《诗经原始》比《诗经通论》更能从艺术形式方面去分析诗篇，并有初步的理论探索，终于恢复了《诗经》的文学面貌，这又是值得重视的。

方玉润字友石，又字黝石，自号鸿濛子，云南广南宝宁人，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死于清德宗光绪九年（1883）。自幼天资聪颖，刻苦好学。二十二岁入县学后，应试凡十五次皆不第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投笔从戎，尝为曾国藩（1810—1872）幕僚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以军功铨选陇州州判，可是任所长宁县已毁于战乱，不得已转而著书讲学。<sup>⑤</sup>他计划成书的有《鸿濛室文钞》一、二集，《鸿濛室诗钞》二十卷，《星烈日记汇

要》四十卷；此外，尚有《鸿濛室墨刻》等。<sup>⑩</sup>

《诗经原始》乃《鸿濛室丛书》的第三种，是方玉润晚年的著作；《自序》“署于同治辛未年小阳月朔日”，<sup>⑪</sup>即一八七一年。本书之刻始于一八七一年仲冬，完成于一八七三年孟夏。<sup>⑫</sup>这就是《鸿濛室丛书》三十六种之三的《诗经原始》陇东分署刊本。一九一四年云南图书馆将此书收入《云南丛书》，列为“经部第七”。一九二四年上海泰东书局又据云南本石印，才广为人知。<sup>⑬</sup>一九六〇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云南本，并再版发行。最新而较好的版本，是一九八六年二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诗经原始》全二册的标点本。据点校者李先耕所言，他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陇东本与云南本相校，发现云南本遗漏错讹二百余处；因此，标点本以陇东分署刊本为底本，以《云南丛书》本参校。<sup>⑭</sup>

《诗经原始》前有《自序》，卷首上包括《凡例》以及《诗无邪太极图（说）》等六图和《幽公七月风化之图》等三表，卷首下为《诗旨》，摘录自先秦至清各家有关《诗经》基本问题的论述，并附方氏案语。一至十八卷为正文部分。按《星烈日记汇要》卷三，同治八年（1869）七月初五日日记记载，方玉润曾说及计划撰写《诗经原始》的梗概：

《诗》无定解，臆测者多，故较他经尤为难释。愚拟广集众说，折衷一是，留为家塾课本，名之曰：《原始》，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也。其例先始诗首二字为题，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，题下如古乐府体式而不用“伪序”，使读者一览而得作诗之意。次录本诗亦仿古乐府一解二解之例，而不用兴也比也恶套，庶全诗联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。诗

后乃总论作诗大旨，大约论断于《小序》、《集传》之间，其余诸家亦顺及之。末乃集释名物，标明音韵。本诗之上眉有评，旁有批，诗之佳处亦点亦圈，以清眉目。然后全诗可无通义，足以沁人心脾矣。<sup>③</sup>

后来写成的《诗经原始》，它的内容安排大抵与此相若。只是补充一点，即个别诗篇有“附录”归纳前人评论，可供参考。

《诗经原始》出版以后，流传未广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著录云南本《诗经原始》十八卷，江瀚撰的《提要》，说此书“其毁经也甚矣”。<sup>④</sup>最先谈到《诗经原始》的，要算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的《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》：“《诗经原始》稍带帖括气，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，但论《诗》旨却有独到处。”<sup>⑤</sup>所谓“帖括气”，即八股时文的习气。本书正文，“眉有评，旁有批，诗之佳处亦点亦圈，以清眉目”，其中确有不少精当的艺术见解，但方氏有时不避“选家”评点八股时文的眼光，过分强调时文的笔阵开合和局势变化，寻章摘句，反而有碍于通盘了解诗意。胡适、顾颉刚对《诗经原始》也发生兴趣，曾作出介绍并打主意重印。<sup>⑥</sup>杨鸿烈（1901—？）、向达（1900—1966）两人在二三十年代调查、考证了方玉润的事迹和著述，分别写就《方玉润先生年谱》<sup>⑦</sup>及《方玉润著述考》<sup>⑧</sup>两篇文章。一九八三年，张明喜写了《向达“方玉润著述考”补正》一文，对向达的考证有所补正。例如向达考定方玉润先后拟目著述的有四十三种，已写成的有二十三种，张明喜则分别修订为四十八种和三十一一种。<sup>⑨</sup>黄美椿于一九八〇年发表的《“鸿濛家书”与方玉润著作》，根据几封珍藏多年的方玉润写给父母、侄子的家书，对方氏的著述及生平事迹作了一些补充。<sup>⑩</sup>日本学者村山吉广（Murrayama Yoshihiro, 1930—）在一九八六年写的《方玉润の生涯

与著述》，也就方玉润的生平和著述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<sup>④③</sup>

过去对方玉润的研究，仅止于考证他的生平和著述，至于他的《诗经原始》就谈得不多，究竟里头有没有初步的文学理论探索似乎乏人问津。一九四七年马子华的《由“诗经”整理论“诗经原始”》、<sup>④④</sup>一九八一年赵制阳的《方玉润“诗经原始”评介》、<sup>④⑤</sup>一九八七年李先耕的《谈方玉润的“诗经”研究》<sup>④⑥</sup>与一九八八年吴培德的《方玉润的“诗经”研究——“诗经原始”读后》<sup>④⑦</sup>等，概略地介绍了《诗经原始》的内容、说《诗》观点、显著特色以及其书的优缺点，虽曾涉及方玉润摆脱传统束缚，对若干诗篇的艺术形式作过分析，可惜都是浮光掠影的，没有集中讨论《诗经原始》所提出的文学理论。一九八七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李康范的硕士论文《方玉润诗经原始研究》，仅仅探讨了方玉润的“六义”说和他反“淫诗”的主张。<sup>④⑧</sup>村山吉广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于日本筑波大学主办的“中国学会大会”上宣读、其后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的《日本中国学会报》上发表的《方玉润の诗经学——“诗经原始”の特质》，同样止于浮面的介绍，讨论并不深入。<sup>④⑨</sup>

我留意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已有好几年了。我知道在清代的《诗经》专著中，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、崔述的《读风偶识》、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最能超出各派之争，独立思考，自由研究，因此被公认为是“独立思考派”；<sup>⑤⑩</sup>其中又以《诗经原始》建立的诗歌理论最圆满自足，它在“诗经学”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。一九八五年，我在香港大学为纪念创校七十五周年而举办的“国际明清史研讨会”上，以《清代传统“诗经学”的反动》为题宣读论文。<sup>⑤⑪</sup>这篇长文主要讨论了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和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说《诗》的观点，以及这两本

书对清代传统“诗经学”所引起的回响。我特别指出他们不但要推翻《毛诗序》，而且要推翻反《诗序》的《诗集传》，甚至惊世骇俗地对什么旧说都表示反对。我也曾提及姚、方两人往往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指摘前人穿凿之失。但这只是文章的一个小节，我没有详细发挥下去，当然也来不及探讨《诗经原始》提到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。

因此，本文之作，目的有二：

一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，探索方玉润如何把《诗经》从“五经”的宝座拉下来，真正变成文学作品，并检查、整理《诗经原始》的有关资料，看看作者所揭橥的文学批评理论。

二、前人研读“经解”，或重故训，或重义理，较少着眼于文学批评方面。即使有志于此，也多参阅论诗评文的“话”、“说”、“谈”、“记”、“论”、“录”、“评”、“言”、“语”、“品”、“格”等类作品。<sup>⑤</sup>从新的角度看《诗经原始》这类属于“经解”性质的专著，可能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。

## 二

如果说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里，对诗歌的欣赏和批评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理论，那是过分其辞了。从点点滴滴的资料来看，《诗经原始》的主要贡献，是作者能突破汉宋经生桎梏，懂得把《诗》当诗来读，即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《诗经》。<sup>⑥</sup>

第一，“舍却《序》、《传》，直探古人作诗本旨”。<sup>⑦</sup>

诗歌婉转咏叹，由于体裁的关系，通过比兴的手法，它的意旨往往不显露。方玉润曾说：“诗人立言多寄托微婉，故足以

感人于无形……后人说《诗》多胶滞鲜通，诂能得会心于言外。”<sup>⑤</sup>他既重视“传”、“笺”、“注”、“疏”的价值，又不满这些“经解”的穿凿附会之失：“《诗》称‘多识’，笺、注之功似未可泯，惟附会穿凿，亦最足以增厌。”<sup>⑥</sup>他跟姚际恒一样，特别反对汉宋经生们的说《诗》观点：“说《诗》诸儒，非考据即讲学两家，而两家性情与《诗》绝不相近。故往往穿凿附会，胶柱鼓瑟，不失之固，即失之妄，又安能望其能得诗人言外意哉？”<sup>⑦</sup>这里说汉宋经生“性情与《诗》绝不相近”，又批评他们不能得诗人言外意，已显露出方玉润有意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，把“三百篇”当作文学、当作诗歌来考辨的端倪。

方玉润尝主张“务抒己见”，<sup>⑧</sup>“循文按义”，“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”。<sup>⑨</sup>例如对《关雎》诗旨就提出新的见解，肯定“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”，以为《毛诗序》的“后妃之德”说，及《诗集传》的“宫人之咏大妣、文王”说，“皆无确证，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，况文王、大妣耶！”<sup>⑩</sup>对争论已久的《周南·桃夭》，也曾提出类似的见解，力斥《毛序》所谓“后妃之所致也”，“不妒忌，则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时”等穿凿谬误，以为“不足以发诗意也”。他的结论是：“盖亦咏新婚诗，与《关雎》同为房中乐，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。特《关雎》从男求女一面说，此从女归男一面说。”<sup>⑪</sup>把《关雎》、《桃夭》等诗与民间婚嫁习俗联系起来，一扫旧说，从新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性质。

他反对曲解诗意。例如《周南·汝坟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道化行也。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，妇人能闵其君子，犹勉之以正也。”<sup>⑫</sup>《诗集传》也重复说：“汝旁之国，亦先被文王之化者，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，因记其未归之时，思望之情如此，而追赋之也。”<sup>⑬</sup>对这种穿凿附会，方玉润质问说：“夫妇人喜其夫



归，与文王之化何与？妇人被文王之化而后思其夫，岂不被化即不思其夫耶？如此说《诗》，能无令人疑议？”且一针见血指出：“大抵学究家说《诗》，必先有一副宽大帽子压倒众人，然后独申己见。故此诗本欲说妇人思夫，而又觉无甚关系，故先言文王之化，以郑重其辞，然后说思夫，以致上下文义不相连贯亦不之觉。”<sup>⑤</sup>批评经生们的以《诗》说教，可谓深刻之至！又如《召南·江有汜》，《毛序》说什么嫡不以媵备数，媵无怨，嫡亦自悔，历来都没有什么争论。方玉润却以为是“商妇为夫所弃而无恚也”，理由是根据诗的上下文，觉得“嫡之待媵，后悔容或有之，善处亦属常情，惟处而乐，乐而至于‘嘯且歌’，恐非嫡妇待妾意。且嘯者，悲叹之辞，非和乐意也”。因此，他改为弃妇之词，实在可信：“诸儒之必为媵妾作者，他无所据，特泥读‘之子归’句作于归解耳。殊不知妾妇称夫，亦曰‘之子’……然则归也者，还归之归，非于归之归也，又明矣。此必江汉商人远归梓里，而弃其妾不以相从……妾乃作此诗以自叹而自解耳。”<sup>⑥</sup>循文按义的好处，是可以推翻经生们的曲说，把古人作诗本意呈现出来。他郑重声明：“《诗》多言外意，有会心者即此悟彼，无不可以贯通。然惟观《诗》、学《诗》、引《诗》乃可，若执此以释《诗》，则又误矣。盖观《诗》、学《诗》、引《诗》，皆断章以取义；而释《诗》，则务探诗人意旨也，岂可一概论哉？”<sup>⑦</sup>

在反对曲解诗意的同时，方玉润又主张从“浅”说《诗》，不去寻求什么“深义”。例如《小雅·鱼丽》，姚际恒说“此王者燕飨臣工之乐歌”，《毛序》谓“文武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”，《集传》谓“宴飨通用之乐歌”，但方玉润以为“此诗本无义意，不过极言肴饌之多且美，故宴飨可以通用”。<sup>⑧</sup>他分析《王风·君